

# 郭廷以與近代史學風

王爾敏

回顧研究中國問題之世界潮流，實以十八世紀創始於歐洲特別是法國之漢學（Sinology）為主要骨幹。東方日本首先受其感染，並形成為東方漢學中心。民初以來，中國學者承襲東西相同潮流，迅速做習，亦構成五十年來中國學界強調之學術主流。但凡此學術宗風，在西方已形成一定之傳統，無論態度方法，研討範圍，並自有一定界限。一般習慣，決不以近代史視為漢學範圍。自來漢學家既不以近代為探討論題，實亦並無

一位學者專擅近代史，此固漢學潮流所形成共喻之習慣。然風氣之創始，當可上溯歐洲早期漢學家醇樸專精好古篤實之偉大風範，原來決無門戶之見存於胸臆。但流風至於日本，已被視為漢學一門家法，恪守原則，不敢有變。及傳至中國，則一些寡識囂張之名流學者，尤其奉為圭臬，演為義理，高言提倡，羣起效法，不敢絲毫逾越。是以近代史研究終須在漢學氣氛之外，自闢蹊徑。

中國學術自身傳統，自司馬遷以來本即注重當代，直至十九世紀末，學者多留有當代問題著述，實非起源於西方之「漢學」所能望其項背。民初中國學者之捨本逐末，一切以「漢學」為宗風。一則是根本上情勢之必然，由於加入世界潮流，即必須追隨他人固有之風習，方可在同等地位之下，爭勝比新，此為不易改變之事實。二則這一時代風氣，由於自卑心理太深，實不敢變更

外人已成之規制。當時中國學界步趨歐洲日本漢學潮流，成為時髦風尚。極力仿行，惟恐不能酷肖。五十年來，儼然已為一代主流。

中國近代史之構成一門學問，雖然上溯可推及夏燮之「中西紀事」，王之春之「國朝柔遠記」，王闓運之「湘軍志」，王定安之「湘軍記」，皆以當代之人撰當代之史，其他同類著述，更不勝枚舉。但言近代史學術性潮流之創始，為時遠在六七十年後。民國初年，首創風氣，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郭廷以創擬「近代中國史」十九冊撰著計劃。民國十八年羅家倫、蔣廷黻、郭廷以計劃合撰近代史一書，以供一般閱讀。民國二十年，羅家倫發表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」。凡此實為近代史學創跡之濫觴。蓋自覺性之研究範圍，宗旨，以至方法，在此時期已大致確定。

一九三〇年代，近代中國史學研究之開創時期，正當中國積弱，又陷於東西帝國主義國家之壓迫侵逼之下，先其所急，學者多致力於中外關係史，外交史，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，外人在華特種利益，不平等條約，租界，治外法權，以至種種喪地辱國之歷史。頗以激勵國人，喚醒民衆為職志。在此風氣下之著作：若蔣廷黻之「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」。郭廷以之「近代中國史」第一第二兩冊。陳恭祿之「中國近代史」，

李劍農之「中國近百年政治史」。大致重點，多以外交史為重心。

當時近代史學風氣另有一系重要範圍，就是對太平天國史研究之狂熱，一時名家輩出，成果豐碩。其中始終一貫，自至少至老畢生研究者則為簡又文，其晚年巨著「太平天國典制通考」三冊，及「太平天國全史」三冊，足以代表此一範圍研究之總結。其次則羅爾綱之「湘軍新志」，「太平天國史綱」，「太平天國史稿」等，並其他考證、辨偽等論文，均為畢生專一從事之研究成果。其次則郭廷以之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」，謝興堯之「太平天國史事論叢」，及「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」，彭澤益之「太平天國革命思想」，蕭一山之「清代通史講義」其太平天國部分，均可稱為一代名家之作。在各方致力研究之下，太平天國歷史之學術成就，可說是最為輝煌。

同一時代近代史名家當不止此，其致力於外交史方面者人才最衆，若梁嘉彬、郭斌佳、王信忠、邵循正、張誠孫等，並有重要專論問世。而近代經濟史研究亦在此期萌芽，若趙豐田、嚴中同樣有專著問世。故抗戰之前，近代史學術風氣，實已顯示擴大發展之跡象。

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，中西學術風氣，均有所轉變。歐洲日本之漢學傳統，固然自守其嚴肅陣營。但西方學者，特別是在於美國，已使研

究興趣廣泛轉至於中國近代問題。同樣西方的淵源亦可上溯至馬士(H.B. Morse)之「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」(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)這三冊巨著。但自覺性之學術體制，實則創始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。

中國方面，對日抗戰結束之後，政府首先忙於各地學術機構之復員，在末及十年之間，由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卓識遠見，乃在民國四十四年二月聘請郭廷以創設近代史研究所，俾與西方學術溝通理念，觀摩方法，乃至尋繹更深入浅出切實之結論。當然郭氏之責任是十分重大。

自民國四十四年以迄今茲，郭廷以所領導之近代史研究，可以說發榮滋長，有一日千里之勢。二十年來，無論所刊布資料，所發行專著，均受國際間極大重視，外人著述研究，多有引列。所出版專著，有英、德、日、韓等文字之書評，並頗稱道其貢獻。



民國十七年創擬近代中國史十九冊撰著計劃時的郭廷以教授。

近代史研究工作，自其創始，本與當代流行學風無所瓜葛，自具源流，自關進境，方法宗旨，各不相干。初期先驅學者，若羅家倫、蔣廷黻均以他事所囿，未能繼續。只有郭廷以始終不懈，愈老彌堅，數十年固執近代史研究本分，深入探究。因是磨勵愈明，創發愈廣，此亦自然所予堅持力行者必有之報酬。蓋近代史研究，無論工具、方法、論題、方向、資料，乃至所遭遇之困難，均與其他各代有所不同。事實上，任何一代歷史研究，亦必各有其獨特之工具、方法、資料乃至獨有之困難。其一切經驗，皆由日久磨練而得，焉能憑一時才知而欲貪望重大成就，如必欲其有，則定必不免於自救救人之廣告術，即令誇炫一時，終不難為後世人識破。

近代史研究之顯著特色，至少有以下四端，即(一)資料繁富，(二)問題複雜，(三)事多隱晦，(四)人多在世。說來簡單，而每句皆包羅甚深甚廣含意，在此不必一一解釋。其中尤為突出特色，最大重心，實在於近代史問題之複雜性。即舉任何單一論題，均可追溯其多面之淵源背景與深遠之後遺影響。為節省篇幅在此略舉兩例，學者若尚有閒暇，請就「留日學生」、「清季的革命團體」兩個單一論題加以探討，如果發現問題複雜而不能理清，就請參考最近刊行之這兩種著作，當可用此驗證筆者言之不誣。

近二十年郭廷以出版著述只有兩種，但蒐羅資料、指導方向、陶訓後學，維持特有學風，則頗為耗竭心力，而研究之方向方法

式，當即學術宗尚之具體表徵，請為一一申敘：其一，研究方向。除了繼續沿承民初以來外交史重點之外，近二十年來，無論內容範圍，均有重大擴展。一個形成近代中國的總體重心，實在於中國本身對西方挑戰之因應。如此必須對於思想之適向與創意，制度之改變，經濟與社會之變遷，均致力加以研討。於是而近代思想史、制度史、工業史、軍事史，以至區域研究，都市研究，均須一一加以從事。這些條目，自非信手輕易亂填，如學者或有閒暇，請一讀這類專著與論文便知。在此舉一小例：近時學界政界新聞界，談現代化者甚多。但若論開山先驅，立論倡說者，仍應推郭廷以為最早。請閱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大陸雜誌一卷二期郭氏所撰：「中國近代化的延誤」，自可明白。

其二，研究方式。近代史學自關蹊徑，獨具風格，並就實際需要，必須以精密深入分析為法。決不就一點一滴之心得，一事一物之考辨，大驚小怪，嚇詐士林。就具體條目而言，首先在多項語言資料基礎。中國近代史實，以西方列強之衝擊為原動力，追溯淵源，不免隨時涉及外國之學說，政策與私見，自不免資料來源之複雜性。其次，在多項理論方法基礎。近代史研究，運用方法理論，決不循單一方向，單一理論，近代史實發展，繁複萬端，豈能如理論家之閉門構思，憑空冥想，生吞活剝，強為化一，納入整套體系，用為解釋歷史現象？近代史家之經驗，對於複雜多變之人事現象，極需審慎小心，以多種方法理論，勘驗豐富資料，然後提出推斷解釋。再次

，在於多項層面發掘追索。近代史家所立論題，全部注重求一問題之答案。凡資料之辨證，時日之考訂，人物史事之考據，皆非主題，亦非主要



郭廷以夫婦離台飛美在機場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合影留念。

對象，此類工作，僅因相關而附帶解決，最多僅能放於註文中說明，甚至有八九並不能佔據正文篇幅。此因論著之實際需要而有之必然結果，並非近代史家故意如此。再說清楚一點，即一種嚴肅之專著，不能充塞大量考辨文字，而達數倍之臃腫。重要之處，在對主題相關背景條件發展線索，須作各個層面之探討，分析，並有其合理解釋。二十年前新聞學家所提倡之立體分析，庶乎近此理想。

其三，研究方法。言及近代史研究方法之運用，尤須回顧民初以來史學界之研究風氣。蓋即泛科學主義影響下所宗奉之科學方法是也。提倡科學方法本為美事，而若干史家，只是迷信科學，奉為符籙，以為無往而不萬能。然空言方法，毫無實際，亦無具體內容，只是望空影響而已，真真愚昧之至。尤愚昧之甚者，即相信史料可自己表達史實，史家不可有所解釋。動色相戒，不敢逾越。但實際從事研究，又不可須臾脫離解釋，蓋自欺欺人之甚，無過於此期高唱科學方法之史家矣。近代史家，其研究起始，必由問題設計入手。運用過程，即須隨時通過縝密評估，步步審慎解釋。故史家教養，要求甚嚴。客觀理性為一般條件，重要手段在於實證之勘驗。實證之條件，以密集資料為依據，條列門類，俾見各種情況，使不至有一偏之蔽。而比較之研究，統計之分析，更列為重要輔助。經此繁複之分析，詳慎之解釋，最後達於結論。如此簡化之結晶，呈現於讀者，如蜂之釀蜜，蠶之吐絲，實已化為一項成品，決非原料之原型。所貴於史家者，在具有

識力而能融會綜合。倉庫裝滿史料，不能自我表達任何史實，抑且盈天地間，史料之確定，實憑史家識力之判斷，或取或捨，皆依史家之探擇而定。史料不能自陳自言，待史家加工而始表現史實功能。故往時學界風氣之變，正需近代史學者予以廓清而糾正之。近二十年來，近代史學者尤注重專論之外部形式。其形制格式，一點一滴均有嚴格規定，不能絲毫紊亂或缺略。而專論制義之嚴肅，正乃表達學術水準之嚴格維持，此亦近代史學者對於工具方法所強調之一項重點。

我國近二十年所出之近代史專論論文，以實證與精密而在國際學術界受到尊重。足以代表國家篤實深厚之學養。推其功績，實不能抹殺郭廷以之影響。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問題，每以發掘新問題，使用新方法，提出新解釋，以宣示學界，流行一時。我近代史學者同道，對其研究情況，十分注意而瞭若指掌，必同時潛心從事，奮力研究，於各類問題，俱表其淵博之學養，卓越之識見。其撰著成果，至少亦資料豐贍，論斷周密，解釋合理，實為必有之顯著特色。尤足以改正往時偏頗誇誕之故說。郭氏如此拋洒心血，創立篤實學風，默默耕耘，爭持國家尊榮。我學界亦當體察覆案，從而認識其對近代史學之重大貢獻。當此一代學人逝去，實我中華民族之一項損失。我史學界同仁，亦必喪此博通淵懿之長者，在此能不令人哀輓悼惜？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十日國慶寫於台北

附註：本文言及先師郭量宇（廷以）先生，乃直書名諱。亦不作任何稱呼，非不尊敬也，蓋為史學學術論著，必有嚴肅義法，尙希郭先生友好鑒諒。